

研究論文

解嚴後民衆社團參與的變遷： 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涵

熊瑞梅 張峰彬 林亞鋒

熊瑞梅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hsung@nccu.edu.tw）。張峰彬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fchang@nccu.edu.tw）。林亞鋒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94254003@nccu.edu.tw）。本文初稿曾發表在2008年11月1日於中研院社會所舉辦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階層組研討會」。感謝編輯委員會與三位匿名評審的寶貴的意見。

收稿日期：2009/3/12，接受刊登：2010/05/29。

中文摘要

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是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關懷的議題，民主政治的效率和市民社會的發展都仰賴民衆積極的社團參與。本研究合併1990、1992、1995、1997、2000、2002、2005、和2007等八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民衆參與社團的資料，引進Yang and Land（2006）的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法，企圖釐清台灣社團變遷趨勢的時期與世代的效應。本研究發現台灣在解嚴後，只經歷很短暫的民衆社團參與成長，民衆社團參與便逐漸地持續下降。細言之，1995到2000年間呈現些微下降，到2000年後劇降，2007年有微升的狀況。根據層級線性分析的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分析，台灣1990-2007年社團參與變遷趨勢，時期和世代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應。經過控制個人特質的固定效應（性別、年齡、族群、大學畢業學歷）後，時期的效應都顯著的大於世代。1990-1995年民衆社團參與率相對保持在較高的水準，但2000年以後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便很顯著。出生於1956-1965年的世代是社團參與最多的世代，其前後兩個世代也是積極參與社團的世代。1980年以後的世代出現顯著地不積極參與社團的現象。大學畢業者在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上的隨機效應是不明顯的，但大學畢業者對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上的隨機效應卻很顯著。本研究企圖從台灣民主轉型和高等教育擴張來詮釋民衆社團參與下降的世代和時期效應的意涵。

關鍵詞：社團參與、情感性社團、工具性社團、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法、民主轉型、高教擴張

**Changes in Participation in Post-Martial Law Voluntary Associations:
Effects and Implications of Period and Cohort**

Ray-May Hsu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chi Univeristy

Fengbin Ch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chi Univeristy

Ya-Feng L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isty

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democr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depend on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We merged eight years of data on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from the 1990, 1992, 1995, 1997, 2000, 2002, 2005, 2007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s, using Yang and Land's (2006) age-period-cohort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ose factors on changes in participation. We identified a short period of growth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following the cessation of martial law in Taiwan, followed by a small decline between 1995 and 2000, a dramatic decline after 2000, and a small amount of growth in 2007. According to results from a 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the influences of period and cohort on these changes are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ge, ethnicity, and attainment of a college degree, the effect of period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cohort. We found that the 1956-1965 cohort was the most active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that post-1980 cohorts were

generally inactive. The effects of college education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expressiv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mong different periods, but wer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instrumental voluntary associations. We discuss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educational expansion in Taiwan.

Keywords: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instrumental associations, expressive associations,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democratic transition, educational expansion

一、前言

近二十年來，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都在憂心「民衆社團參與呈現下降的趨勢」。政治學家Putnam（1995）使用美國多年期全國性的民衆社團參與調查資料，發現美國民衆社團參與的下降趨勢；進而警告美國人，有利於民主發展的社團參與所蘊含的信任規範和來回交換互惠性（reciprocity）的網絡社會資本正在下降。若美國社會一般信任下降，會導致政府治理效率下降，進而危及民主政治的發展。Skocpol（2003）針對這樣的下降趨勢，指出社團組織趨向組織化與制度化後，造成社團組織漸漸由菁英來管理，社團內跨階級的互動減少，組織民主的精神漸漸喪失，導致公民參與的意願降低。不論是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反省這個趨勢，都可見民衆社團參與趨勢的下降是一個學術上重要的研究問題，但在趨勢分析方法和變遷趨勢的解釋上仍在一個探索的階段。

1987年的政治解嚴是台灣民主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自主性社團得以合法地發展。然而，台灣過去在探討民衆社團參與的議題，多半偏向社會運動組織動員發展的個案研究，或是使用零星片段的統計資料來展現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故，至今仍缺乏完整且有代表性的長期資料來具體呈現變遷的趨勢與意涵；也因此，我們無法確立解嚴後民衆社團參與的趨勢，並進一步解釋可能的結構因素。有些研究使用內政部公布的社團參與資料描述性地呈現台灣社團參與趨勢（王甫昌 2003；顧忠華、林勝偉 2004），這些研究呈現解嚴後台灣民衆參與社團是快速成長的趨勢。然而，林亞鋒（2007）比較1992、1997、和2002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民衆社團參與數目時，卻發現台灣民衆參與社團數目有下降的趨勢。可見，資料的片段和資料品質沒有確立，及分析方法的不一致，都

會導致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確立與解釋的問題。故從事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研究時，首先要在分析策略和分析方法上確立一個比較細緻的趨勢分析技巧；繼而，還需探索解釋影響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制度轉型力量。

在分析策略上，西方學者在分析民衆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時，都會考量依照社團的類型，來觀察變遷趨勢。例如：Putnam（1995）的研究發現真正造成美國民衆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主要是指民衆參與鄰里性社團和教會的數目下降；反之，參與新興的婦女和環保團體的數目是呈現成長的趨勢。本研究在社團參與的類型分類上，透過嚴謹的文獻回顧概念化過程，及統計分析策略，採用「情感性社團」和「工具性社團」的分類，並企圖觀察民衆在不同類型社團參與上的變遷與意涵。情感性社團主要是在滿足會員的內部需求，促進成員的情感連帶與凝聚力；工具性社團是結合會員的集體行動力量，有目的地向組織外的社會與政府爭取利益，改變政策。鄰里和教會等社團，是傾向於情感性社團；而婦女和環保社團是屬於工具性社團。

社會學家提出各種較精深的趨勢分析方法，可以分解並驗證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效應。Paxton（1999）將時期當成自變數，對民衆一般信任和社團參與數目進行因果關係分析，結果發現時期對民衆社團參與數目沒有任何顯著影響。其實，將一般社會調查多年期資料合併，過去多半是使用世代分析，但世代分析無法釐清時期、年齡和世代之間的相關。直到Yang and Land（2006）從2004年以來一系列的論文，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Effects Model, CCREM），來驗證時期和世代的影響效應；社會變遷趨勢的成分效應才得以更精緻地被分解和驗證。本研究企圖引進他們的分析方法來分解並釐清台灣民衆從1990年以來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時期和世代效應。

爲了要解釋解嚴以來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時期和世代的制度變遷意涵，本研究企圖從兩股社會制度轉型趨力來探索之。一股社會力是來自於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另一股社會力則是來自於台灣的高等教育擴張，大學畢業者或中產階級對於社團參與的理性化變遷模式。政治學者認爲台灣的民主轉型是一個由上而下，由國家主導漸進改革的模式，並非像西方民主化發展過程中，以市民社會爲基礎的由下往上發展的模式（Gilley 2008）。故，在解釋反省台灣民衆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時，本研究特別注意台灣民主轉型經驗與經驗資料的關聯性。社會學家在探索台灣社團參與和社會運動組織興起的社會力解釋時，多半主張社會參與的成長源自於中產階級的興起（蕭新煌 1990）。照理說，從1990年以來，台灣高等教育快速擴張是有利於民衆的社團參與和市民社會的發展。高等教育的人多半是中產階級的來源，這群人的社團參與行爲是相當利益導向的理性選擇，期望社團參與的行動能有效地影響公共政策。隨著高教擴張，大學畢業生會參與更多的社團。

總之，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在企圖使用較精緻的統計分析，勾勒台灣解嚴後民衆真實的社團參與圖像；並嘗試從兩股與這個社會變遷趨勢關聯的制度轉型來詮釋台灣解嚴後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社會學意涵。本研究將使用1990、1992、1995、1997、2000、2002、2005、2007等八年的社會變遷調查民衆參與社團的資料，進行兩階段的分析。第一個階段是描述民衆在各個社團參與八年的變遷趨勢。第二階段則使用Yang and Land（2006）的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法，企圖釐清對台灣民衆社團參與變遷的影響效果。同時，我們也特別關注大學畢業的受訪者對於參與社團數目的影響效應，在不同的時期上的變化。最後，我們進一步地針對民衆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和工具性社團數目進行相同的模型分析。也企圖探索高等教育擴張後，大學畢業對情感性社團及工具性社

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如何隨時間變化而變異。

二、文獻探討

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相關研究存在許多爭論，在文獻探討時，我們首先回顧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相關文獻，及討論情感性和工具性社團類型在研究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分析的意義，並針對分析方法的討論作一個簡單回顧與反省。繼之，本論文企圖從解嚴後的民主轉型與高教擴張來探索與台灣社團參與下降趨勢的關聯性。

(一) 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研究發現與爭論

Putnam (2000) 在《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 一書中，具體的提出美國民衆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引發學術界和公共政策界很大的震撼。Putnam (1995, 2000) 使用美國一般社會調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觀察到美國民衆在1974到1994年間，參與幾個重要組織的比例都在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主要社團是和教會有關的團體、勞工工會、兄弟會、退伍軍人協會、和學校服務有關的協會。此外，使用相同的題組，觀察不同年度的各項公民參與的指標 (教會出席、公眾會議出席、投票率和花在鄰里社交時間、感覺信任的程度)，結果都呈下降趨勢。社會學家後續針對Putnam (1995) 社團參與的下降趨勢的研究，使用相同資料，嘗試各種處理時間趨勢分析的方法與技巧，研究發現常出現不一致的現象。大致歸納的原因有二：社團參與類型意義不同，長期變遷趨勢也不同；隨著長期趨勢分析方法的改進，有關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分析有更精緻的發現與結論。以下將就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研究

爭論，分成這兩個部分來討論。

1. 社團參與的類型與社會學意義

社團參與的類型不同，其變遷趨勢也不同，因此，在從事社團參與變遷研究時，先區分社團參與類型可以減少不同類型社團參與變遷趨勢造成的混淆效果。許多西方研究也指出民衆參與不同類型的社團所生產出來的聯繫和功能是不同的。Putnam及後續社會學者進一步分析相同資料的結果，也指出美國民衆社團參與下降快速的社區型和教會型的社團，會快速地瓦解社會凝聚力。大多數有關民衆參與社團組織的研究，都會進行社團參與的分類，只是不同研究會採用不同分類概念定義。

不同類型的社團參與究竟有何社會學意義？法國社會學家Rose（1954）認為志願組織可以分成情感性組織（expressive organizations）和具有社會影響力（social influence）的組織；前者是滿足成員興趣和情感滿足，後者則是參與團體希望透過團體的集體行動，對社會產生影響力及企圖改善社會的福利和就業條件。簡言之，前者是一種自我抒發情緒的情感性組織，後者則是透過集體行動產生公共政策改變的工具性組織。一些社會學家將民衆的社團參與分成地方性和跨地方性組織，也進一步發現地方性的組織是促進同質性的聯繫，但跨地方性的組織是促進異質性的聯繫。社團參與是地方性的類型，則社團參與偏向情感連帶與地方集體認同的功能；但社團參與屬於跨地域的組織，則社團參與傾向於工具性的目的與功能（Feld 1982; Kalmijn and Flap 2001; Marsden 1990; Popielarz and McPherson 1995）。所謂工具性志願組織是組織成員為組織以外的活動和目標而努力，例如：職業團體和政治團體，都爲了要透過立法，爲社會或成員獲取更多利益。但情感性的組織，則組織內部成員在參與組織內部活動時，便能滿足組織成員自身的需求和社交性功能

(Glanville 2004)。

社會網絡的學者，長期以來在分類社團參與的類型時，會考量社團類型所奠基的同異質性或強弱聯繫和功能。一般而言，情感性社團，多半是仰賴血緣、地緣及宗教等社團，社團內部成員聯繫強度較強，同質性較高，容易形成封閉性的網絡，進而產生較高的結構凝聚力 (McPherson, Smith-Lovin and Cook 2001)；例如：Coleman (1988) 指出社區鄰里學校父母子女間網絡關係的封閉性，有利於信任規範的形成和社會控制功能的產生。工具性的社團傾向於集結異質化和較弱的聯繫，工具性的社團較易將來自不同階級身份地位的人，藉著弱聯繫，將異質化的個人和團體連結成一個鬆散整合的社會 (Breiger 1974; Granovetter 1973)，故工具性社團參與具有橋樑者的效應。Putnam (2000) 也認為一些鄰里性的社團參與有助於凝聚 (bonding)，而一些跨區域的社團參與有助於搭橋 (bridging)。

林南 (Lin 2001) 使用1997年台灣社會變遷資料，企圖將六種社區協會和七種一般志願組織分別進行因素分析。六種社區協會分成參與村里團體和參與教會團體兩群。七種志願組織分成專業和政治團體。再將這四種團體進行二度因素分析，而產生了地方性 (local) 和全面性 (global) 社團的社團參與類型。Lin (2001) 發現地方性的社團參與和民衆特質的差距 (range) 無關，但全面性的社團參與民衆，其各種社經特質差距明顯地較異質多元。

主計處社會發展趨勢調查 (2003) 比較民國88年和民國92年的民衆社團參與。這個調查發現最近一年 (2003年) 台灣民衆參與一個及多個社團的民衆占28.11%，相對是低於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結果。再更進一步地觀察細分類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可看出民衆參與社團比例下降的社團有職業團體、政治團體、學術文化團體。但不變的甚至成員增加的社

團包括宗教團體、學校社團、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醫療衛生團體、休閒團體和宗親會、同鄉會和校友會。這些資料顯示了，台灣民衆在情感性社團參與上保持穩定或成長趨勢，但工具性社團參與上則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從以上民衆參與不同類型社團比例變遷的趨勢來看，和過去一些片段的統計資料是不一致的；以上台灣民衆參與情感性和工具性社團變遷模式的差異，在過去社會學家個案的社會運動組織動員研究中，也不容易觀察到。

總之，不論是從有關社團參與類型的文獻，或從官方民衆社團參與統計來看，在理論概念定義和實際資料分類模式上，情感性和工具性社團的分類是較恰當的。

2. 社團參與趨勢分析方法的演進

社團參與變遷研究的分析方法，在不同的時段，分析技術上有不同的進展。在1980年以前有關社團參與變遷的分析停留在不同時期社團參與的描述性分析；亦即將不同時段，民衆人口社會經濟地位特質對社團參與進行交叉分析的卡方檢定，及比較不同時段，這些基本人口社經地位對社團參與的影響有哪些變化。Hyman and Wright (1971) 針對美國在1950至1970年間的社團變遷進行描述性分析時，發現這段期間，教育程度高和社經地位高的人，參加社團數目也較多；但考量這些影響社團參與的人口社經地位特質在時間的變遷上，又發現美國在1960時期時低地位和黑人對參與社團數目的正面影響力增加。可見，社經地位對於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會隨著時間區段有所改變。

而後續一些社會學家使用Putnam (1995) 的社團參與變遷資料，企圖分析時期對於不同類型社團參與的影響效應，也嘗試使用不同的統計分析方法，常得到不一致的研究結果。Bear, Curtis and Grabb (2001)

重新使用Putnam（1995）的資料，將社團參與類型分成所有的社團參與類型，和剔除工會與教會的社團參與類型。結果發現，美國教會和工會在1974-1994年是呈現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當沒有納入這兩種社團參與類型時，美國民衆社團參與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換言之，研究若不考量參與社團的類型，則很難精確地掌握社團參與在時期上變遷的模式。此外，Rotolo（1999）控制年齡和教育水準，將時期當作一個變項，觀察時期的非線性效應。他發現社團參與趨勢是一個非線性，在1974-1984年間社團參與是下降，但在1984到1994年間有增加趨勢。Paxton（1999）使用美國一般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20年的資料，採取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SEM）模型來處理時間、信任、社團參與等多重指標間複雜因果關係。將時間當作這些結構模型的外衍變項，結果發現時間變遷趨勢的效果不是那麼明顯。雖然，Paxton（1999）使用SEM分析方法，將時間當成一個面向因素，企圖將時間和社團參與的共變關係找出來，但這樣的分析，仍然無法釐清趨勢變遷分析中的年齡、世代和時期對依賴變項產生的混淆效應。這種混淆效應會造成估計係數不穩定（Ryder 1965; Mason and Feinberg 1985）的問題。近年來，有關年齡—時期—性別趨勢分析技術有些新的突破，故對於許多社會變遷的趨勢分析，產生很大的影響。

時間趨勢的分析從過去世代分析研究演進到最近興起的年齡—時期—世代分析（age-period-cohort analysis）。近年來人口學家Yang and Land（2006, 2008）針對使用大型長時期的橫剖面調查資料，進行趨勢分析，他們建議使用年齡—時期—世代分析。長久以來，趨勢分析中有一些影響成分是需要被拆解，長期趨勢的調查資料中，年齡、世代和時期之間是有線性關係，某個時間點的時期資料是等於受訪者出生世代加上年齡。這個線性關係，使得過去使用世代分析時，若將這三種

類型資料放在同一個層次的分析單位來分析，則會彼此產生高的共線關係，使得估計誤差大，估計值不穩定。Yang and Land（2006, 2008）使用Cross-Classified Random-Effects Model（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CCREM）來釐清趨勢變遷分析中的世代和時期效應（Raudenbush and Bryk 2002）。他們將出生世代分成每五年一個世代，出生世代和時期可以製作成一個交叉分類列聯表，這個列聯表的方格則是屬於時期與世代的交叉分層樣本數，當我們合併多重時期的大型調查資料時，每個時期對應世代的方格次數是不同的。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的層級線性分析，可以釐清依賴變項受世代、時期和個人差異的影響力。

本研究企圖引進這樣的研究分析方法，來釐清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在年齡、世代和時期的效應。民衆社團參與會隨著年齡、世代、和時期而有變化。一般而言，民衆年齡對於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是呈現倒U型（Erickson 2004），民衆會隨著年齡從20歲到中年呈現社團參與增加，從中年到老年會逐漸下降的趨勢。不同出生世代的民衆所經歷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是不同的，故出生世代的社團參與行爲也不同。政治民主開放的時代，民衆社團參與比較踴躍；以美國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1950-1970時期，是美國政治經濟強盛的時代，社團參與增加。從1974-1984年，社團參與下降，1984到1994年略微上升。換言之，1974到1984年期間，美國遇到兩次石油危機和通貨膨脹，可見經濟和政治不穩定的時代，民衆社團參與有下降的趨勢。過去研究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幾乎都沒有將年齡、世代和時期的效應區分。因此，研究成果會出現不一致的現象。

本研究若能使用年齡—時期—世代的最新趨勢分析技巧，有效地釐清世代和時期對於社團參與的效應；緊接著所面臨的問題，究竟是有那些社會轉型的力量，較能適當地詮釋台灣民衆在解嚴後的社團參與變遷

趨勢？

(二) 社會轉型與社團參與變遷

此外，本研究企圖針對解嚴後二十年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在時期與世代效應上的社會學意義作一個探索性的文獻回顧與詮釋。本研究歸納文獻，發現解嚴後的二十年間，影響社團參與在時間變遷上的社會轉型力量有兩個：民主轉型和高教擴張。

1. 民主轉型與社團參與變遷

Putnam (1993, 1995, 2000) 一系列的研究主張民衆的社團參與和有效的民主制度發展是長期互為因果的制度建構過程。亦即民衆社團參與的程度越踴躍，民主制度的政府組織治理效能越高 (Tocqueville 1961)；政府治理效能高，則更誘使民衆參與社團，關懷監控政府效能 (Fung 2003)。Putnam (1993) 主張民衆社團參與變遷模式，是與民主制度效能互為因果的制度化過程，他嘗試從社會資本與歷史的制度理性選擇觀點，來分析義大利民衆社團參與和地方民主制度效能之間的長期動態關係。Putnam (1993) 使用12個區域政府制度效率指標，發現北部和南部區域成對比，北部政府制度表現較佳，北部義大利有歷史以來，社區市民協會網絡就很豐富，經濟生活較佳，政治制度表現也較佳。誠如前面文獻已指出，Putnam (1995, 2000) 後續使用美國一般社會變遷調查民衆社團參與資料，揭露美國人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造成民衆的一般信任下降，及對政府效率監控機制喪失，進而影響民主制度的發展。

Skocpol (2003) 從社會學的角度卻提出對美國民衆社團參與數目下

降趨勢不同的解釋。她認為由於美國社團組織越來越朝向菁英和專業的領導管理，使得會員喪失了民主參與和價值分享的機會，也使得社團中較少產生跨越階級界限的友誼，故使得原本在社團中多數人參與的集體行動，成為少數人透過菁英組織管理來從事議題決策和行動。故，人們藉著社團參與，產生對公共政策的公平參與，進而影響民主政府運作的效能機制，漸漸喪失；因而促使民衆對社團參與產生疏離，進而導致民衆社團參與數的下降。

以上這種從民主制度發展和民衆社團參與的宏觀因果邏輯來推理的社會變遷機制，可說是一種西方社會典型的由市民參與主導的民主制度發展過程。根據研究東亞民主發展的學者的觀點，台灣的民主制度是一種民主轉型模型（democratic transition）（Gilley 2008）。Cheng and Haggard（1992）認為台灣的政體轉型，是國民黨與反對勢力策略互動的政治過程結果。台灣的民主轉型模型大致上是從威權統合的路徑依賴制度轉型而來的（Gilley 2008），基本上是由國家主導的民主轉型。國民黨政府面對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內部反對運動壓力，及外部國際地位和經濟危機，在蔣經國政體末期，宣布解嚴，是民主轉型的第一階段。解嚴後到1990年代，大致上是李登輝掌權的國民黨民主改革期。1990年李登輝採納學運人士和教授的意見，承諾民主改革，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這個時期，正是民主轉型理論的社會動員階段。故，這段期間社會學者投入社會運動與組織動員研究的作品較多。到了1996年，總統直選，台灣民主轉型走向一個較完整的階段。在1990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動員和反對黨的勢力越來越組織化，使得台灣在2000年時，成功地產生政權移轉到民進黨。政治學者將台灣的民主轉型經驗歸類「混合國家／社會引導」（mixed state/society-led transition）的民主轉型模型（Gilley 2008: 225），亦即早期由國家主導改革，繼而社會運動與組

織動員和反對黨的社會力促使政權和平移轉的模型。本研究企圖更進一步，具體地從文獻回顧中，整理出1990到2000年間的社團參與和社會運動組織研究的發現，及2000年後民進黨執政對民衆社團參與相關的文獻與論述，以便整理出1990年以後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可能有的解釋策略。

從民主轉型的模型觀點來看，解嚴後1990年代初期，市民參與模式可說是一個以社會運動力量來挑戰國家威權的「國家發展混合模型」時期。蕭新煌及尹保珊（1998）便在那個時期，提出台灣公民社會的可能性觀點；他認為台灣社會運動與資源動員的能量與能力，是有助於發展直接參與民主的公民社會。根據Diamond（1999）的觀點，公民社會是一個獨立於政府之外的部門，本身具有自我組成與自我支持的能力，是受到法規與制度規範的社會參與生活場域。台灣即使在1990年代出現明顯的社會動員與民主改革特質，但仍然是一個國家主導由上而下的民主轉型模式。Diamond（1999）也認為許多新興的民主國家，民主制度發展不穩定，未看到民主帶來的效率和國家發展，反而造成市民社會參與的退縮，以致形成民主倒退的現象。

1990年代是國民黨李登輝執政的時代，國民黨統合的各種團體組織也漸漸鬆綁；同時，這也是台灣社會運動組織與本土化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內政部提供的社團組織成員的數目，呈現1990年代初期台灣社團組織會員快速成長的圖像（王甫昌 2003；林勝偉、顧忠華 2004）。過去威權體制時，國民黨滲透到各個同業公會和職業工會，台灣的社團參與在國民黨一黨威權統治之下，民衆缺乏自由結社的能力。職業團體（工會與商會團體）幾乎都被國民黨員的領導幹部控制，無法代表團體成員的利益，社團主要功能在配合國家政策，會員較少有自主意識（朱雲漢 1989）。在威權體制瓦解後，這樣的統合侍從主義鬆綁；加上台灣的勞動力大多屬中小企業，故不利於工會的成長；1990年代可說是民

衆參與職業團體的工會、商會、農會與漁會等團體下降的時期（李允傑 1992；蔡東杰 2002: 190）。從社會學家從事的社會運動個案研究中，可看出由知識份子啓動的環保、婦女和教育改革社會參與是呈現成長的趨勢。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在解嚴前是由專家、草根力量、和黨外人士啓動與組織動員的，解嚴政治民主化後到1990年代底，環境運動也漸漸組織化與制度化（何明修 2000, 2006）。范雲（2003）也針對婦女運動組織，進行了完整的運動者的傳記記錄資料蒐集與分析，發現台灣婦女運動的領導者，在1980年代時，便以非草根性的基金會組織形式推動婦女權益議題；到了1990年代，新一批的婦女運動者，積極地推動性政治和政黨認同，企圖產生社會更全面的影響力。

統計資料和個案研究都呈現，2000年政權轉移，民進黨執政後，反而出現明顯的社團參與快速下降的現象，該如何解釋？林亞鋒（2007）整理台灣1992、1997、2002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社團參與資料，發現2000年以後民衆參與非地方性社團的數目急速下降。從國內外文獻及研究成果可歸納出三個解釋方向。一個是當社團組織發展到制度化的階段所普遍存在的問題。2000年後，當社團數目越來越增加，社團彼此競逐社團會員，社團要能永續經營，持續發展，社團組織自然要更加組織化和專業化（李丁讚 2004）。民進黨政府的政策，也朝向讓社運組織朝向制度化管理及體制化，因此，也陷入Skocpol（2003）所提及的一旦社團組織走向菁英管理專業化，會喪失民衆民主參與的能力，進而造成民衆疏離，民衆參與社團下降的趨勢。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台灣民間社團組織和傳統地方派系勢力的競爭能力。Madsen（2008）發現台灣的社團間的連結效果不強，他也指出台灣如慈濟的宗教團體的成長、組織與動員能力。台灣地方性和宗教性社團在2000年後相對穩定，且有成長的趨勢，這和美國民衆參與鄰里和

教會數目下降的趨勢是相反的。這意味著國民黨執政時代，扶植的地方派系，或以廟會地方宗教為主的地方勢力始終都具有其特殊歷史制度路徑依賴的影響力量。2000年後，有研究台灣社區公共參與和公民性的田野研究，發現台灣一些投入社區總體營造的專業性組織，進入社區進行社區改革，專業組織的影響力仍然很難和傳統地方派系與廟會所結合而成的地方勢力競爭，故社區總體營造的市民組織力量反而最後無法產生社區改革的功能（吳介民、李丁讚 2005）。也因此，究竟地方派系是否仍然在台灣的地方政治有影響力，因為使用研究的資料和分析方法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論述。王金壽（2004）深入地分析某個縣市各鄉鎮的地方派系發展過程，似乎勾勒出地方派系在選舉動員能力上的衰退，故使得地方派系展現瓦解的趨勢。然而，徐永明、陳鴻章（2004）使用1983-2001年區域立委選舉資料，發現地方派系雖然有選舉動員效率降低的趨勢，但在政黨勢力競逐和議會地位影響力有深化強化的趨勢。也有個案研究發現，台灣廟會仍然和地方政治動員形成緊密結合重疊的關係，進而較全面地影響地方居民生活（蔡常斌 2005）。

最後的可能解釋是1990年代台灣社會動員期所生產的社運組織和社團組織領導人才，在2000年後納入行政系統所造成的影響效果。吳介民（2002）觀察到，民進黨在2000年執政後，過去從事民間社團組織與民主運動領導人才，大量投入執政團隊，造成社會改革運動和社會改革議題，相對地空洞化，故促使民間組織動員能力遞減。這種現象應該也可以部分解釋台灣在2000年以後民眾社團參與急遽下降的原因之一。

總之，隨著解嚴後，台灣民主轉型從初期的國家與社會混合發展時期，到市民社會漸漸自主且社團參與朝向組織化與制度化；演進到政權移轉的新興民主國家，由於民主效率不彰，導致市民參與倒退的現象。

2. 高等教育擴張與社團參與變遷

一個社會高等教育的擴張，有助於社會的現代化與理性化。社會資本的研究者認為社會的理性化，是可以從人們的社團參與重疊模式和變遷趨勢來解釋。Coleman認為社會發展是從原初關係發展到法人組織化的社會。在Coleman的現代社會分析中，人們的社會活動參與，從早期的家庭和鄰里等「原初的社會結構」(primordial social structure)，進展到許多社會活動都由國家和市場等「組織法人的社會結構」(corporate social structure)來主導(Coleman 1990: 585)。人們經常是在各種社團組織活動中，認識新朋友。Völker, Flap and Mollenhorst (2009)在荷蘭進行全國性調查，發現荷蘭舊世代的民衆，所參與的家庭、鄰里和其他各種社團活動，成員重疊。但年輕世代的民衆，則經常在工作場所和教育機構認識新朋友，這些組織也和鄰里和家庭等場合遇到的朋友不會重疊。荷蘭的民衆參與社會各種類型的活動場合，越來越朝向工具性、目的性和特殊性的方向發展。

民主發展的現代化理論觀點，主張市民社會參與的興起，主要是經濟發展和中產階級興起使然。許多個案研究也證明，台灣在1990年代消費者運動、環境運動、婦女運動和教育改革運動都是知識份子的中產階級投入推動的。解嚴後，中產階級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中產階級藉著參與社團，進行自主且自由的結社並致力於對社會議題的反省與批判(朱雲漢 1990)。

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在台灣民主運動和市民參與的發展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台灣早期中產階級主要的組成份子多半是國民黨遷台帶來的外省籍文官和管理人員；新中產階級則主要以具有專業技能、大學學歷及管理能力的成員。蕭新煌(1990)主編的《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一書中，多位學者研究企圖勾勒以大學畢業和專業人員組成

的新中產階級對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的反應。蔡淑鈴（1990）發現受過大學教育者和專業人員都認為自己所屬的階級和其他階級間有較高的利害衝突；但這群高等教育和專業者在支持農民上台北抗議的態度上，相對地比其他階級保守；但他們仍然關懷公平正義的事務。蕭新煌（1990）認為這群大學畢業及專業者，具有相當理性現實的性格，對社會改革運動也樂觀支持，若社會變遷不會帶來壞處，會支持；否則也會選擇撤退。從這些研究的論述，可以推導出台灣大學畢業的高等教育民衆，從1990年以來，和其他教育團體比，他們仍然是比較積極參與社團，有助於市民社會發展的一群人；但由於台灣過去經歷政權移轉和經濟衰退，政治經濟的不穩定，也影響這些高等教育者在社團參與數目的時間變遷效應是下降的趨勢。

台灣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在社會參與上會有世代的差別。從世代（cohort）的角度來解釋社會行動的差異，在西方文獻上，已經有相當長的學術傳統。Mannheim（1952）認為一個人所處的世代，就如同其所屬的階級一般，會賦予個人在社會和歷史時點當中一個特殊的位置。也因此讓這樣的一群人擁有特別的思考模式。

Inglehart（1990: 56）從西方國家的調查資料中發現二次大戰後出生的世代，在價值觀和態度上跟先前世代有明顯的差異。戰前出生的世代，有物質缺乏的經歷，因此重視經濟成長和工作保障。而戰後出生的世代則比較強調環境保護，以及生活品質的維持，甚至會以犧牲經濟成長來換取這樣的價值優先性。Putnam（2000: 275）則認為在戰爭時期成長的人，會終其一生投入市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Davis（2004）則利用GSS的長期重複性調查資料顯示相對於其他世代，在1960年代進入16歲年紀的美國民衆，在權威、家庭、言論自由、種族、及性關係方面，終其一生都保持比較開放的價值與態度。蕭阿勤（2008）指出世

代、知識份子與台灣公共論述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台灣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對於台灣公民社會參與和台灣認同的公共論述上有世代的差別。在1970年代的大學生在學校社團和社會參與的公共論述上，都呈現社會服務和民族意識的集體情感。但在1980年代的大學生，則是積極參與社會改革和推動台灣主體意識論述。1970年代的大學生，則是1950年代出生的世代。但1980年代的大學生則是1960年代出生的世代。我們認為這兩個世代與台灣各世代相比，應該是參與社團較多的世代，但1970年代以後出生的大學生，對於公共參與的投入應該是呈現下降的趨勢。在台灣社會的發展經驗上，70年代受到一連串如退出聯合國等外交挫折的衝擊，當時年輕人感受到國家社會生死存亡的危機，從而激發出許多社會行動（蕭阿勤 2008）。相對於之前和之後的年輕人，這群戰後出生、在70年代讀大學的世代，在歷史事件的衝擊下，展現出有別於其他世代的特殊行爲模式。

中外文獻也顯示教育程度對民衆社團參與的效應在時期上是有差異的。Skocpol發現從1975到1995年間，美國大學畢業者平均參與社團數是比其他教育群體高，但變遷的趨勢是下降的。但其他教育群體的平均參與社團數目、社團參與比例沒有明顯下降（Skocpol 2003: 187）。張茂桂（1990）觀察在1987年解嚴前，台灣知識份子在各種類型的社團組織扮演重要的領導性角色，例如：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婦女運動組織、環保組織、勞工組織、及原住民組織等。在1987年後這些知識份子仍持續投入這些社會改革社團組織，但這些社運組織在解嚴後有較多的政黨人士投入，使得知識份子從核心漸漸地被邊緣化，進而退縮疏離。

台灣高等教育擴張對大學畢業者參與社團數目的影響效應，在時期上會有不同的變化。台灣從解嚴後高等教育快速擴充，大學家數從1986年的16所增加到2008年的102所；學院從1986年的12所增加到2008

年的45所。Gesthuizen, van der Meer and Scheepers (2008) 使用2004年 Eurobarometer Survey及層級線性迴歸模型來分析28個國家的調查資料，探討教育擴張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在個人層次的分析上，發現教育程度對大部分的社會資本指標都具有正面的影響，但卻對地方性的鄰里互動和活動參與沒有影響。具體而言，他們發現教育程度高者較會參與社團，公民意識較強；但教育程度低者，有比較高的地方主義，比較偏好鄰里互動和參與地方性的活動。在國家層次的分析上，他們發現教育擴張程度高的國家，國家內部民衆參與正式與非正式社會資本的不平等差異變小。此外，也發現教育擴張會對民衆社團參與機率有正的效應，但對社團參與捐獻呈負面的效應。他們認為一個國家教育擴張程度大，則會使得這個國家內部的高教育和低教育者比較可能互動，且高教育程度者帶領低教育程度者加入社團的可能性增高，進而整個國家民衆參與社團數目會增加。然而，教育擴張對民衆社團參與的研究不但稀少，且仍然存在不一致的結果，目前找到的文獻也只限於跨國比較研究，缺少長時期社會變遷資料的分析，本研究企圖從大學畢業者對參與社團數目的效應在時期上的變遷來探討，也是一個新的探討教育擴張與社團參與變遷的策略。

三、研究方法

(一) 資料來源和變數測量與描述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是合併台灣社會變遷二期一次(1990)，二期三次(1992)，三期一次(1995)，三期三次(1997)，四期一次(2000)，四期三次(2002)，五期一次(2005)，五期三次(2007)

等八次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¹這八次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都具有社團參與資料。其中1990、1995、2000、和2005年是一組完全相同問法的社會變遷調查問題：請問目前你參加哪些團體？選項有：（1）宗親會（2）職業團體（如工會、農會、商會）（3）宗教團體（4）同鄉會（5）康樂團體（如土風舞、早覺會）（6）校友會（7）祠堂、祭祀公業（8）政治團體（如政黨等）（9）社會團體（如獅子會、扶輪社、青商會、學術團體）（10）其他團體。在1992、1997、2002和2007年的問卷中也有問你目前參加哪些團體，1992和1997年和前述的社團參與類屬相同。但從2002和2007年的選項設計有些變更，政治團體選項沒有了，但多了參加哪些政黨的題目。在社團參與的選項上多了社區管理委員會和社區發展協會。爲了能從事八年的比較，1992、1997、2002、2007年的資料，只要是受訪者有參加政治團體或政黨都只過錄成參加了政治團體；由於2000年以前，沒有社區管理委員會和社區發展協會，故將這個社團選項歸類成其他社團。本研究在分析時，刪除其他社團，保持八年的社團參與類屬完全相同；如此，可以從事社團參與時間變遷的比較。

1992、1997、2002、2007年社團參與的問題，我們爲了能從事比較，將政黨併入政治團體，最後使用九種社團參與來分析。當我們將這八年的社團整理成九組相同的社團，便可以將八年的資料合併成完全一致的九種類型社團。並進一步地使用Mplus進行探索性類別因素分析，九個社團參與變項區別出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命名成情感性社團：依照因素負荷值的大小順序爲宗親會、同鄉會、社區祭祀團體和宗教團

¹ 作者在研究過程中，曾經選擇四個年度資料（1992、1997、2002和2007年）以維持相等的時間距離來驗證台灣民衆社團參與變遷的趨勢，其分析結果和八個年度結合的資料相類似。爲求時期—世代交叉細格內有足夠的樣本數，進而獲得較穩定的估計係數，本研究採用八個年度的合成資料作爲分析的基礎。

體；從前面文獻探討的概念化定義，到客觀的因素負荷值的順序，可定義這些類型的社團都是強調家族、鄰里和宗教等強聯繫組成的集體情感強且凝聚力高的社團。第二個因素命名成工具性社團，依照因素負荷值大小順序分別為社會團體（如獅子會、扶輪社、青商會、學術團體）、康樂團體（如土風舞、早覺會）、政治團體（如政黨等）、職業團體（如工會、農會、商會）及校友會等由弱聯繫組成的工具性利益團體。

本研究使用到的分析變項有性別（1=男性，0=女性）、年齡、大學畢業與否（以教育年數16和以上為標準）、族群（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大陸外省、原住民）。有關於這些基本變項和社團參與的描述性分析分別在表1和表2。表1是八年資料的民衆平均社團參與數、情感性與工具性社團參與數、性別、年齡、大學畢業生比例、及族群比例的概況。整體上說來，性別、年齡及族群的變化並不大，維持著相當穩定的變遷趨勢。在大學畢業生比例中，1995及1997年以後比例顯著的上升，1997-2000從9.9%增加到14.8%、2000-2002及2002-2005都以將近4%的比例增加，最後到了2007年，約有1/4的人擁有大學畢業及以上的學歷，充分反應出台灣高教擴張的現象。

此外，平均個人參與社團數則呈現下滑的趨勢，在1990-2000年間相對穩定，但在2000年後開始大幅滑落，到了2005年的時候，幾乎只剩下前期的一半，但在2007年的時候，有開始回復的跡象。

表2是9個社團在八年中變化的情形，為了較易觀察，區分成情感性社團以及工具性社團。在情感性社團中，其變化的趨勢較不明顯，約都在11%-16%間變動，但如果仔細比較個別四個社團，可以發現在宗親會、同鄉會及祠堂祭祀公業這三種的變化並不大，比例的變動主要來自於宗教團體，而宗教團體到了2007年的時候，有開始微幅上揚的現象。

在工具性社團中，變化就相當明顯，從1992到2005年止，都是持

表1 社團參與之描述性統計資料，1990-2007年

	1990年	1992年	1995年	1997年	2000年	2002年	2005年	2007年	總計
社團參與數 ¹	.73 (.91)	.73 (.91)	.74 (.95)	.66 (.87)	.70 (.94)	.49 (.85)	.44 (.79)	.63 (.97)	.65 (.91)
情感性社團參與數	.19 (.48)	.15 (.41)	.21 (.49)	.13 (.39)	.19 (.43)	.12 (.37)	.15 (.40)	.19 (.46)	.16 (.43)
工具性社團參與數	.50 (.71)	.55 (.77)	.48 (.71)	.47 (.69)	.46 (.72)	.32 (.63)	.27 (.57)	.34 (.64)	.44 (.69)
平均年齡 ²	38.70 (11.35)	40.79 (11.82)	40.01 (11.37)	40.96 (11.46)	41.61 (11.23)	40.35 (12.71)	40.73 (12.74)	41.19 (12.67)	40.47 (11.91)
男性	47.1%	45.8%	49.6%	49.6%	49.5%	48.3%	50.1%	49.6%	48.6%
大學 ³	9.9%	8.5%	11.0%	9.9%	14.8%	18.3%	23.9%	24.5%	14.3%
族群 ⁴									
閩南	73.2%	74.1%	69.6%	78.0%	74.7%	77.4%	73.4%	74.5%	74.5%
客家	13.1%	11.8%	14.3%	10.9%	10.5%	11.7%	15.5%	13.3%	12.6%
外省	12.7%	13.5%	13.2%	9.4%	12.5%	9.7%	9.7%	10.8%	11.5%
原住民	1.0%	.6%	2.9%	1.8%	2.4%	1.2%	1.5%	1.4%	1.5%
總計 (N)	2521	2324	1831	2566	1622	1667	1825	1695	16051

¹ 括弧內數值為標準差。

² 三期三次以前調查之母體年齡為20歲到65歲，四期三次後才取消65歲以上之限制，為了整體的統一，因此本研究將四期三次之後65歲以上也都排除掉。

³ 學歷為大專以上之比例，本文定教育年數16年為到達此一標準。

⁴ 族群僅保留四大族群以便後續處理及分析。

表2 各時期參與各社團之情況

	1990年	1992年	1995年	1997年	2000年	2002年	2005年	2007年	總計
情感性社會	311 (15.9%)	306 (13.2%)	331 (18.1%)	292 (11.4%)	279 (17.2%)	186 (11.2%)	248 (13.6%)	276 (16.3%)	2319 (14.4%)
宗親會	145 (5.8%)	82 (3.6%)	95 (5.2%)	82 (3.2%)	64 (3.9%)	28 (1.7%)	51 (2.8%)	53 (3.1%)	601 (3.7%)
宗教團體	210 (8.3%)	179 (7.7%)	205 (11.2%)	190 (7.4%)	186 (11.5%)	144 (8.5%)	180 (9.9%)	211 (12.4%)	1503 (9.4%)
同鄉會	70 (2.8%)	55 (2.4%)	41 (2.2%)	35 (1.4%)	33 (2.0%)	21 (1.2%)	30 (1.6%)	26 (1.5%)	311 (1.9%)
祠堂祭祀	56 (2.2%)	29 (1.2%)	41 (2.2%)	30 (1.2%)	17 (1.0%)	13 (0.8%)	12 (0.7%)	23 (1.4%)	221 (1.4%)
工具性社團	1068 (42.4%)	995 (42.8%)	751 (41%)	1034 (40.3%)	640 (39.5%)	452 (27.1%)	435 (23.8%)	562 (33.2%)	5937 (37%)
職業團體	632 (25.1%)	464 (20%)	467 (25.5%)	516 (20.1%)	354 (21.8%)	180 (10.6%)	178 (9.8%)	208 (12.3%)	2997 (18.7%)
康樂團體	109 (4.3%)	74 (3.2%)	97 (5.3%)	83 (3.2%)	90 (5.5%)	72 (4.3%)	97 (5.3%)	55 (3.2%)	676 (4.2%)
校友會	232 (9.2%)	144 (6.2%)	108 (5.9%)	67 (2.6%)	106 (6.5%)	72 (4.3%)	64 (3.5%)	92 (5.4%)	885 (5.5%)
社會團體	88 (3.5%)	126 (5.4%)	93 (5.1%)	126 (4.9%)	127 (7.8%)	91 (5.4%)	124 (6.8%)	78 (4.6%)	851 (5.3%)
政治團體 ¹	200 (7.9%)	475 (20.4%)	118 (6.4%)	425 (16.6%)	75 (4.6%)	126 (7.4%)	28 (1.5%)	145 (8.6%)	1592 (9.9%)
至少參與一個社團	1216 (48.2%)	1107 (47.6%)	884 (48.3%)	1112 (43.3%)	744 (45.9%)	539 (32.3%)	548 (30.0%)	613 (36.2%)	6763 (42.1%)
總計	2521	2324	1831	2566	1622	1667	1825	1695	16051

¹ 二期三次及三期三次中有政治團體及政黨兩種選項，四期三次之後只有政黨，為方便處理將政治團體及政黨合併為政治團體類。

續下滑的的趨勢，從1992年42%的民衆參與工具性社團，下降到2005年僅23%的民衆參與工具性社團。民衆參與工具性社團的比例，也是到了2007年的時候，才又往上彈升。仔細觀察個別工具性社團比例的變化，變動主要的原因來自於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民衆參與職業團體的比例，2005年約只剩下1990年的三分之一，從25.1%急遽下降到9.8%，民衆參與職業團體比例快速下降的趨勢和民衆參與政治團體比例快速下降的趨勢很類似。民衆參與政治團體的變遷趨勢，應該要分成兩組變遷時段模式來觀察，亦即分別就1990（7.9%）、1995（6.4%）、2000（4.6%）、2005（1.5%）（這四年社團題組相同）的變遷模式；以及1992（20.4%）、1997（16.6%）、2002（7.4%）、2007（8.6%）（這四年社團題組類似）來比較。在2005年以前，兩個民衆參與政治團體比例變遷模式都是持續下降的趨勢。前者模式的民衆參與政治團體的比例普遍比後者模式偏低，主要原因是問卷設計的答項不同使然。²可見，在工具性社團的下降主力，明顯的是由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所造成的。

表3是根據樣本的時期以及其世代別製成的交叉表，時期就是每次調查的年份，而在世代方面，主要是參考人口學的設計，爲了使得每個世代人口數有足夠樣本，以確立模型係數的穩定性，故二次大戰之後出生者是以10年爲一個間距。本研究在合併資料時，只包括20歲到65歲的人口，將這些人口分成1926-1945（二次大戰前）、1946-1955、1956-1965（九年國教開始）、1966-1975、1976-1988等世代。在樣本的調查時期及其世代所形成的交叉表中，可以看到每個人都被歸類爲某一調查年的某個世代別，如此就可以進一步的運用層級線性模型（Hierar-

² 前者的調查中將政黨直接列入政治團體內；而後者則是區分成兩題來問，或僅問是否參與政黨，後者的參與政治團體過錄是凡參與政治團體或政黨，便是有參與政治團體，故比例普遍偏高。

表3 世代 (Cohort) 和時期 (Period) 之人數交叉表

世代 (Cohort)	時期 (Period)								總計
	1990	1992	1995	1997	2000	2002	2005	2007	
1926-1945	660	679	379	461	227	185	124	56	2771
1946-1955	719	587	494	624	347	339	371	322	3803
1956-1965	865	750	615	794	535	407	425	452	4843
1966-1975	277	308	343	627	377	376	393	353	3054
1976-1988	0	0	0	60	136	360	512	512	1580
總計	2521	2324	1831	2566	1622	1667	1825	1695	16051

chical Linear Models, HLM) 來分析時期以及世代對於社團參與的影響，其中特別關懷大學畢業者與社團參與的斜率在時期的變遷上是否有差別。

(二) 分析模型的設定

本研究是採用Yang and Land (2008) 多層次的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 (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CCREM) 分析法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他們的分析方法是將大型橫剖面調查多年重複測量的資料合併，進行年齡—時期—世代分析 (age-period-cohort)。將多年期資料合併後，要建立一個世代和時期的列聯表，行是時期，列是在不同時期的世代層。

由於時期與出生世代和年齡的線性依賴關係，造成估計方程式的認定問題 (identification problem)，人口學家使用加總方式來計算不同時期，不同出生世代的生命統計指標；但社會學的調查分析單位往往是個人的。一般人口學的調查，可以使用五年時段為一個區隔，但在個人資料分析時，我們可以將由出生世代群和時期做成的列連表中的方格視為

一個時期與世代的交叉聚集，這些交叉聚集可以使用層級線性模型的交叉分類隨機模型方式來估計時期和世代效應，又可以解決年齡、時期與世代的線性依賴效應。Yang and Land (2006) 的方法，在相同時期和出生世代者分享相同的隨機誤差。若將年齡、時期和世代放在同一層次的線性關係上來估計，是會造成認定問題。世代和時期組成的群落，放在第二層次來分析，可以將世代和時期組成的群落視為脈絡的隨機變項。如此，便可以進行檢定。可以使用層級線性模型的混合模型來估計脈絡效應。第二層次的脈絡效應採隨機的預設，對於世代與時期的方格不平衡的條件下，是比較適用的。

本研究企圖針對三個依賴變項（所有社團參與數目，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進行分析模型，每一個依賴變項有三個分析模型。第一個模型是只有時期和世代效應的原始模型（unconditional model）。第二個模型是將性別、年齡、族群（客家、外省、原住民，對照組是本省閩南）和大學畢業當作固定效應，而時期和世代交叉分類當作第二層。第三個模型則是預設大學學歷不是固定效應，會隨時期產生隨機效應。本研究決定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果之前，是參考了過去的文獻論點和進行了探索性的統計分析。過去文獻中指出大學畢業者被視為台灣民主改革過程中重要的中產階級社會力量；文獻中也有主張一個國家高等教育擴張會有利於民衆社團參與數目增加。此外，本論文在探索性的統計分析上，嘗試探討大學畢業和時期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是否有顯著的交互作用，結果發現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不是固定的，而是會隨時期變化的，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故在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模型的設定時，才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應的。

我們表格呈現的方式將採用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373-398) 的分析步驟，先呈現只有層級一的個人層次和層級二的世代和時期層次的原始模型，其次再放入層級一的固定效應和層級二的隨機效應條件模型。最後再加入大學畢業者和時期隨機效應的模型。我們將所有社團參與數目的第三個模型設定如下：

個人層次：

$$\text{所有社團參與數目}_{ijk} = \beta_{0jk} + \beta_1 \text{性別}_{ijk} + \beta_2 \text{年齡}_{ijk} + \beta_3 \text{本省客家}_{ijk} + \beta_4 \text{大陸各省}_{ijk} + \beta_5 \text{原住民}_{ijk} + \beta_6 \text{大學畢業}_{ijk} + \varepsilon_{ijk}$$

第二層次：

$$\beta_{0jk} = \gamma_0 + \mu_{0j} + \nu_{0k}$$

$$\beta_{6jk} = \gamma_6 + \nu_{6k}$$

在上述公式中， β_{0jk} 為個人層次的截距，代表的意思是第j個世代第k個時期的個人平均社團參與數目。而 γ_0 則為細格層次的截距，表示全體受訪者的平均社團參與數目； μ_{0j} 為世代j的殘差隨機效應； ν_{0k} 為時期k的殘差隨機效應。此外，

$\beta_{0j} = \gamma_0 + \mu_{0j}$ 代表所有資料合併後的各個世代平均社團參與數目； $\beta_{0k} = \gamma_0 + \nu_{0k}$ 代表所有資料合併後的各個時期平均社團參與數目； $\beta_{6jk} = \gamma_6 + \nu_{6k}$ 代表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會隨著不同時期而變動。

四、研究發現

表4、表5、表6分別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CCREM）來估計影響民衆參與所有類型社團總數、參與情感性社團總數、參與工具性社團總數的個人層級固定效應係數和世代時期層級的隨機效應變異數成分。以下將分別描述三個表的係數意涵。

表4模型1是只有估計世代和時期等第二層次的影響民衆所有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的原始模型（unconditional model）。模型1呈現世代和時期對民衆社團參與總數都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其中世代影響效應（.038）比時期（.003）來得大。模型2是加入了個人層次的性別、年齡、族群和大學畢業等固定效應變項的模型。在模型2中，所有的個人層次的變項是採用grand-mean centered的估計變數，整個模型的deviance比模型1減少了781，自由度增加了6，若使用卡方分配檢定，是顯著的。可見這個模型的配適度（goodness of fit）是比模型1來得好。在模型2中，控制了個人人口特質變項後，世代的隨機效應減少（變異數從.038降到.005）。這表示在控制人口變項之後，民衆參與所有社團數目因出生世代所造成的波動會減少；主要原因是年齡與世代有高度相關所致，故放入年齡變項後，世代的淨效應便大量減少；但時期效應反而突顯出來，且呈現顯著增加的現象（變異數從.003上升到.014）。放入所有的人口變項後，模型2中的世代和時期對民衆參與所有社團數目的效應仍然是顯著的，且更能真正呈現時期比世代大得多的事實。

模型2中的固定效應呈現男性比女性參與社團數目多；年齡越大，參與社團越多；本省客家、大陸各省、和原住民都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參與社團數目較多；大學畢業以上者比其他教育程度者顯著地參與較多社團。模型3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

表4 社團參與的層級線性模型，1990-2007年

固定效應	模型 1 原始模型		模型 2 條件模型—大學學歷 效應固定		模型 3 條件模型—大學學歷 效應依時期隨機變動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截距	.561***	.090	-.204*	.079	-.184*	.073
性別			.257***	.013	.255***	.013
年齡			.014***	.001	.014***	.001
族群 (vs. 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200***	.020	.201***	.020
大陸各省籍			.074**	.021	.071**	.021
原住民			.359***	.054	.358***	.054
教育程度 (大學 vs. 專科或以下)						
			.270***	.020	.287***	.055
隨機效應						
世代 (Cohort)						
1926-1945	.210***	.026	-.072*	.029	-.068**	.025
1946-1955	.176***	.024	.068*	.028	.061*	.024
1956-1965	.059*	.023	.077**	.027	.070**	.023
1966-1975	-.150***	.025	-.010	.029	-.015	.025
1976-1988	-.295***	.030	-.064*	.032	-.048	.029
時期 (Period)						
1990	.019	.025	.134***	.030	.118***	.026
1992	.032	.025	.131***	.030	.106***	.026
1995	.042	.026	.095**	.031	.093***	.028
1997	-.010	.025	.019	.030	.013	.026
2000	.053*	.027	.037	.032	.033	.028
2002	-.082**	.027	-.134***	.032	-.119***	.028
2005	-.081**	.027	-.190***	.031	-.176***	.028
2007	.025	.027	-.091**	.032	-.067*	.029
時期*大學						
1990					.111*	.049
1992					.292***	.054
1995					-.051	.054
1997					.035	.049
2000					-.017	.051
2002					-.125**	.047
2005					-.091*	.042
2007					-.154***	.043
變異數						
世代效應 $\text{var}(b_{00j}) = \tau_{b00}$.038***		.005***		.004***	
時期效應 $\begin{bmatrix} \text{var}(c_{00k}) & \text{cov}(c_{00k}, c_{06k}) \\ \text{cov}(c_{06k}, c_{00k}) & \text{var}(c_{06k}) \end{bmatrix}$.003***		.014***		$\begin{bmatrix} .011*** & .010 \\ .010 & .021*** \end{bmatrix}$	
個人效應 $\text{var}(e_u) = \sigma^2$.735		.700		.698	
離異數 (Deviance)	40660.049		39878.827		39839.863	
自由度	4		10		12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5 情感性社團參與的層級線性模型，1990-2007年

	模型 1 原始模型		模型 2 條件模型－大學學歷 效應固定		模型 3 條件模型－大學學歷 效應依時期隨機變動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應						
截距	.156***	.039	-.107***	.020	-.106***	.021
性別			.039***	.007	.039***	.007
年齡			.006***	.000	.006***	.000
族群 (vs. 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109***	.010	.109***	.010
大陸各省籍			.026*	.011	.026*	.011
原住民			.305***	.027	.304***	.027
教育程度 (大學 vs. 專科或以下)			.018	.010	.017	.010
隨機效應						
世代 (Cohort)						
1926-1945	.110***	.014	-.006	.007	-.005	.007
1946-1955	.059***	.014	.008	.007	.008	.007
1956-1965	.011	.013	.010	.006	.010	.006
1966-1975	-.068***	.014	-.009	.007	-.009	.007
1976-1988	-.112***	.016	-.003	.008	-.004	.008
時期 (Period)						
1990	-.007	.014	.034***	.009	.035***	.009
1992	-.046**	.014	-.011	.009	-.014	.010
1995	.021	.015	.035***	.010	.037***	.010
1997	-.041**	.014	-.031***	.009	-.032***	.009
2000	.021	.015	.011	.010	.013	.011
2002	-.019	.015	-.033**	.010	-.035**	.011
2005	.016	.015	-.018	.010	-.020	.011
2007	.054***	.015	.013	.010	.015	.011
時期*大學						
1990					-.014**	.004
1992					.006	.004
1995					-.015**	.005
1997					.013**	.004
2000					-.005	.005
2002					.014**	.005
2005					.008	.005
2007					-.006	.005
		變異數		變異數		變異數/共變數
世代效應 $\text{var}(b_{00j}) = \tau_{b00}$.007***		.000***		.000***
時期效應 $\begin{pmatrix} \text{var}(c_{00k}) & \text{cov}(c_{00k}, c_{06k}) \\ \text{cov}(c_{06k}, c_{00k}) & \text{var}(c_{06k}) \end{pmatrix}$.001***		.001***		$\begin{pmatrix} .001*** & -.010 \\ -.000 & .000 \end{pmatrix}$
個人效應 $\text{var}(e_{it}) = \sigma^2$.180		.177		.177
離異數 (Deviance)		18056.788		17748.122		17746.779
自由度		4		10		12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6 工具性社團參與的階層級線性模型，1990-2007年

	模型 1 原始模型		模型 2 條件模型—大學學歷 效應固定		模型 3 條件模型—大學學歷 效應依時期隨機變動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應						
截距	.405***	.056	-.109	.068	-.086	.060
性別			.218***	.011	.216***	.010
年齡			.009***	.001	.008***	.001
族群 (vs. 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092***	.016	.092***	.016
大陸各省籍			.048**	.017	.045***	.017
原住民			.055	.043	.054	.043
教育程度 (大學 vs. 專科或以下)			.251***	.016	.267***	.049
隨機效應						
世代 (Cohort)						
1926-1945	.097***	.024	-.072**	.025	-.065***	.019
1946-1955	.115***	.023	.054*	.024	.049**	.018
1956-1965	.047*	.022	.064*	.024	.057**	.018
1966-1975	-.081***	.024	.006	.025	-.001	.019
1976-1988	-.178***	.027	-.052	.027	-.039	.023
時期 (Period)						
1990	.028	.024	.101**	.026	.085***	.020
1992	.081***	.024	.146**	.026	.124***	.020
1995	.024	.025	.058*	.027	.052*	.021
1997	.032	.024	.053*	.026	.044*	.019
2000	.036	.025	.024	.027	.018	.021
2002	-.068**	.025	-.099***	.027	-.085***	.021
2005	-.103***	.025	-.174***	.027	-.153***	.021
2007	-.029	.025	-.109***	.027	-.085***	.021
時期*大學						
1990					.109**	.037
1992					.252***	.040
1995					-.026	.040
1997					.047	.037
2000					.000	.038
2002					-.128***	.035
2005					-.111***	.032
2007					-.145***	.032
		變異數		變異數		變異數/共變數
世代效應 $\text{var} (b_{00j}) = \tau_{b00}$.013***		.004***		.003***
時期效應 $\left[\begin{matrix} \text{var} (c_{00k}) & \text{cov}(c_{00k}, c_{06k}) \\ \text{cov}(c_{06k}, c_{00k}) & \text{var}(c_{06k}) \end{matrix} \right]$.004***		.012***		$\left[\begin{matrix} .009*** & .010 \\ .010 & .017*** \end{matrix} \right]$
個人效應 $\text{var} (e_u) = \sigma^2$.461		.438		.436
離異數 (Deviance)		33160.497		32348.273		32289.242
自由度		4		10		12

* p < .05, ** p < .01, *** p < .001

應，世代和時期的效應仍然顯著。模型3的deviance比模型2少了39，增加了2個自由度，經卡方分配檢定，仍然是顯著的，可見模型3比模型2配適度更佳。在模型3個人層次的固定效應，大致上和模型2類似，僅教育程度對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更加顯著，這意謂著大學畢業和時期的交互作用是顯著的，因此，模型3考量大學畢業與時期的交互作用時，大學畢業的主效應更加顯著（從.270增加到.287）。至於在表4的模型2和模型3當中1990年到2000年間的時期效應從顯著的正向係數轉變到不顯著，而且在2000年之後，時期效應進而再轉變成顯著的負的效應。可看出時期對民衆社團參與數目影響的效應是穩定的下降，每一個時期群組是和時期層級的截距（或群組平均數）來比較。明顯可見1990、1992、1995年等時期民衆參與社團數目顯著地比所有時期群組的平均值多，故效應也比平均值高；到了1997和2000年時，民衆參與社團的數目已趨近所有時期群組的平均值，故效應呈現與平均值沒有顯著的差異。過了2000年以後，2002、2005、和2007年時，民衆參與社團數目顯著地比所有時期平均參與社團數目來得低，故效應呈現顯著負的效應；但到了2007年時較低的趨勢有減緩的現象。

表5呈現解釋民衆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的模型。模型1是只有估計世代和時期對民衆所有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模型1呈現世代和時期對民衆情感性社團參與總數有顯著的影響力，但時期的效應反而比世代來得小。從前面描述性的資料上已經發現台灣民衆在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上，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模型2是加入了個人層次的性別、年齡、族群和大學及以上等固定效應變項的模型。在模型2中，整個模型的deviance比模型1減少了309，自由度增加了6，若使用卡方分配檢定，是顯著的。可見加入個人特質固定效應的模型的配適度是比模型1來得好。同表4的發現，在表5的模型2中，控制了個人特質變項後，由於年

齡與世代的相關，當年齡被控制後，則世代對民衆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的淨效應便比時期來得低。模型3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應，模型3的deviance比模型2少了1，卻增加了2個自由度，經卡方分配檢定，模型3沒有比模型2更加顯著配適，還多用了兩個自由度。故解釋民衆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使用第2個模型即可。在模型2中，大學畢業與否和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無關。男性比女性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較多，年齡越大，參與情感性社團越多。本省客家、大陸各省、和原住民都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較多。

表6是呈現影響民衆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效應。模型1仍呈現世代比時期對民衆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效應來得大。模型2加入了個人層次的性別、年齡、籍貫和大學畢業及以上等固定效應變項的模型。模型2的deviance比模型1減少了812，自由度增加了6，若使用卡方分配檢定，是顯著的；可見這個模型的配適度是比模型1來得好。誠如表4和表5一樣，在模型2中，控制了個人特質變項後，時期對民衆的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反而比世代來得大。模型2中呈現男性比女性參與工具性的社團數目較多；年齡越大，參與工具性社團越多；本省客家、大陸各省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較多，但原住民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和本省閩南民衆沒有顯著差別。大學畢業以上者比其他教育程度者顯著地參與較多工具性社團。模型3將大學畢業對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上視為隨機效應，時期的效應仍然比世代大。模型3的deviance比模型2的少了59，增加了2個自由度，經卡方分配檢定，仍然是顯著的，可見模型3比模型2配適度更佳。在模型3個人層次的固定效應，和模型2比變動不大，僅有教育程度對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效應增加幅度較大（從.251增加到.267）。

本研究更進一步地將模型中的平均殘差效應（average residual

effects) 以圖示呈現，圖1、2、3、4分別是世代、時期、年齡和大學畢業與時期交互作用對參與所有社團數目、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和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平均殘差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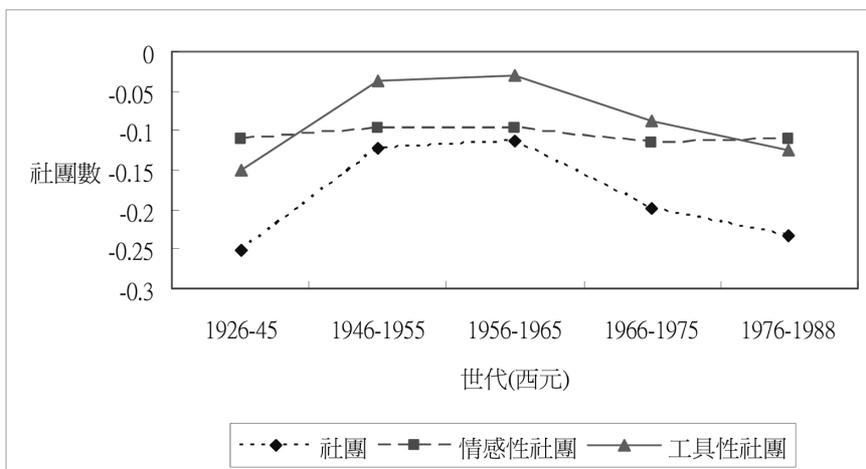


圖1 社團參與的世代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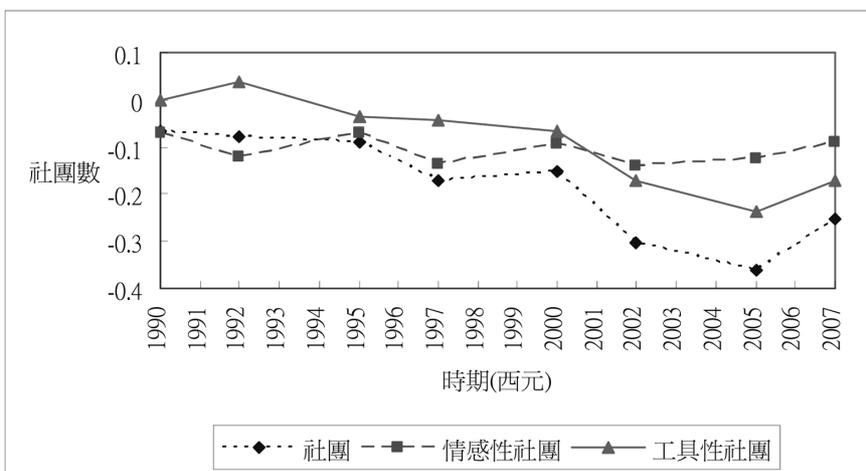


圖2 社團參與的時期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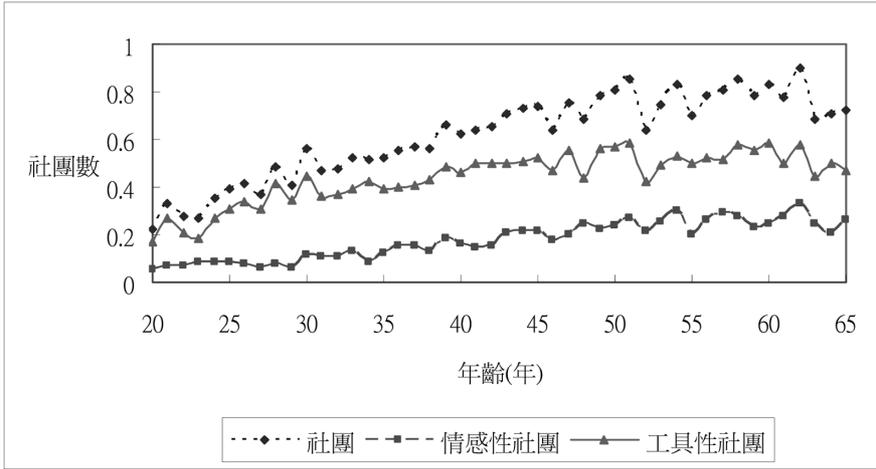


圖3 社團參與的年齡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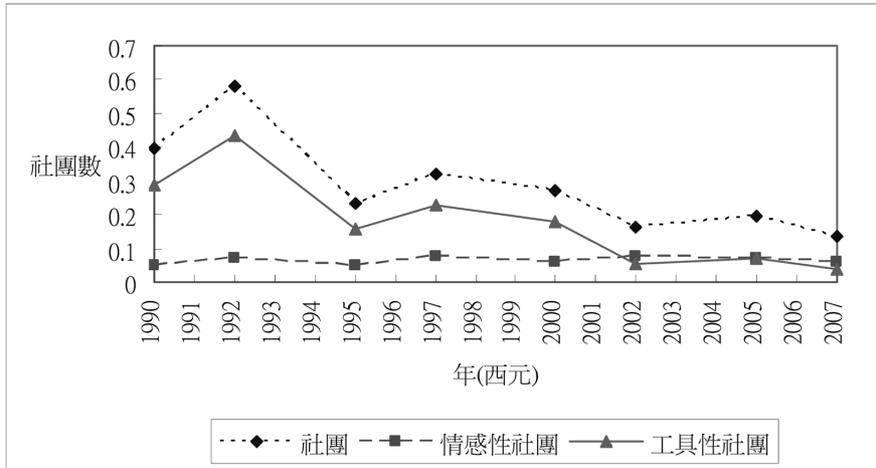


圖4 不同時期大學文憑對社團參與的效應

圖1呈現三種類型社團參與的世代效應：1946年以前（二次大戰前）出生的世代整體參與社團數目偏低，1946-1955及1956-1965世代是社團參與數目最多的世代（表4），之後的世代參與社團數目持續下

降。1946-1955年出生的世代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世代，1956-1965年出生的世代又經歷了九年國教的教育擴張。1965年出生的世代在青壯年時期，經歷了台灣政治解嚴和國會議員全面改選，1987年政治解嚴這個世代的人22歲，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時，這個世代的人27歲；可見1956-1965年出生世代的人口是台灣社團參與數目最多，最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的世代。1966年以後出生後的世代在青壯年時期經歷了一連串的經濟（東南亞風暴和2000年的網路泡沫經濟）和政治劇變（政權移轉），參與社團數目持續降低。然而，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世代的效應上，看起來沒有太大的變遷，相當穩定。不同世代參與工具性社團的效應仍然和整體參與社團數目的效應模式類似，呈現倒U的曲線，早期出生和晚期出生的世代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較少，1956-1965年出生的世代仍然是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最多的世代。

圖2呈現三種類型的社團參與的時期效應：民衆參與社團的總數在時期的平均殘差效應變遷模式上，變化最大的時期是在2000年到2005年；圖2中可看出2000、2002、2005年間的時期平均殘差效應巨幅下降。2000年前，僅有微幅下降的趨勢，2007年有微幅上升的趨勢。若參照表4來看，在1995年以前，雖然時期對整體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係數有些微下降的趨勢，但時期的效應仍然是保持正效應（例如：模型3的時期效應1990、1992、和1995年分別是.118，.106，.093）。反之，民衆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不同時期的變遷上變化不大，若要對照表5的時期效應係數來看，可看出時期對情感性社團參與的效應，上下起伏不大；可見過去二十年，民衆在情感性社團參與上是相當穩定的。民衆工具性社團的參與數目的時期效應殘差變遷模式類似整體社團參與數目時期效應殘差變化；從2000年以後快速下降，在2007年才略為回升。

圖3呈現三種類型社團參與的年齡效應：民衆從20歲到50歲左右，

年齡對整體和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平均殘差效應持續增加，之後，便呈現沒有明顯變化的趨勢。但年齡對於民衆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的平均殘差效應，雖然仍然是隨年齡增加而微幅增加，但增加幅度很小。

圖4呈現三種類型社團參與的大學學歷與時期隨機效應的估計值：³大學畢業者在整體社團和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跨不同時期的估計值曲線是平行的。換言之，台灣大學畢業者的整體社團參與數目和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上的變遷模式是相當類似的。從1992年以來，台灣大學畢業者整體和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便開始下降，2000年後又持續下降，近年來下降趨勢減緩。大學畢業者對參與情感性社團的隨機效應是不顯著的（如表5的模型3所顯示），即大學畢業者在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上沒有變遷。

整體而言，從1990年以來台灣民衆社團參與數目下降的趨勢，可說是因為台灣民衆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變遷模式所致。更有趣的是，這個下降的趨勢對受過高等大學教育者而言，是更加明顯。

五、結論與討論

首先，本研究發現台灣在解嚴後，只經歷很短暫的民衆社團參與成長時期，便逐漸地持續下降。若從美國第二次大戰後民衆社團參與數目的變遷資料，可看出：美國的民主政治發展，是經歷1950-1970年很長一段民衆社團參與增加的歷史發展經驗，一直到1970年以後才有下降的

³ 大學學歷對社團參與數目具有正向的固定效應影響力，但這個影響力隨著時期呈現隨機效應，且時期的隨機效應在整體社團和工具性社團參與上是呈現負向的變遷趨勢。故在圖4上，本研究使用大學固定效應加上時期隨機效應的殘差估計值來圖式，以便於理解大學學歷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實質效應在時期的變遷模式。

趨勢。反觀台灣民衆的社團參與成長的經驗太短，僅有1990和1992年呈現成長趨勢；在1995年到2000年間，經歷了東南亞風暴和國民黨的分裂等經濟和政治的不穩定，民衆參與社團的數目便持續下降。經過嚴謹的年齡—時期—世代分析，時期和世代對民衆社團參與數目都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應；當控制年齡變項時，時期效應又較世代效應來得大。大學畢業者對情感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期的變異上不明顯，但大學畢業者對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時期的變遷上卻很顯著；具體而言，大學畢業者從1990年代初期以來，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便顯著地下降。

世代的效應比時期弱，但仍然能夠顯著地解釋台灣民衆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過去學者指出台灣1970和1980年代的大學生或知識份子，對台灣社會運動和民主改革都是具有貢獻的世代；本研究也發現1956-1965年出生的世代社團參與數目最多，這個世代的人上大學的時期應該是1974-1983，故可間接地解釋了1956-1965出生的世代是最積極投入社團的世代。

時期對台灣民衆社團參與數目的變遷趨勢產生較大的效應。過去學者使用內政部公布的社團社員資料，呈現了和本研究相反的變遷趨勢。本研究的貢獻是，使用從1990年以來八年的全國性代表樣本，來釐清台灣民衆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世代與時期效應；特別是指出了大學畢業者對工具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效應，隨著時期逐漸減少。這樣的結果也意謂著台灣的民主轉型仍然沒有穩定的市民社會參與作為基礎；從1990年野百合學生運動到1992年的立委全面改選間，可說是民衆參與社團的高峰期；之後，便緩慢下降，到2000年後政權轉移，則快速下跌。2000年後民衆社團參與數目快速下降的趨勢，一方面可以呼應吳介民（2002）克勞賽維茲魔咒論，亦即是1990年代台灣社會動員期所生產的社運組織和社團組織領導人才，在2000年政權轉移後，納入行政系統，

故造成民間組織缺乏領導動員人才，這種現象應該也可以部分解釋台灣在2000年以後民眾社團參與急遽下降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可以支持Diamond（1999）東亞新興民主的公民民主制度不易鞏固的論點。

此外，若根據Gesthuizen, van der Meer and Scheepers（2008）的研究發現來推論，照理說，台灣的高等教育擴張，應該是對市民參與的提升有幫助，也期望對台灣民主的發展和效率能夠提升。但本研究結果指出台灣大學畢業者對參與社團總數和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的影響效應，隨著時期呈現下降的趨勢。過去十年的高等教育擴張，使得台灣大學畢業民眾到2007年，已達到1/4的樣本人數，但這些中產階級的主要構成者，社團參與數目下降得很快。這樣的發展趨勢會令人擔心不利於健全民主市民社會的發展。當然，台灣大學畢業生的快速增加，並沒有如預期地創造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帶領低教育程度者來參與社團的現象，進而提升全民社團參與的程度；未來仍需要更進一步地研究來探討高等教育擴張為何無法提升民眾社團參與的可能原因。

從1990年以來，台灣民眾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的變化不大，但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卻呈現下降的趨勢，這樣的變遷模式究竟有哪些社會學意涵？民眾參與情感性社團中，主要以參與宗教團體比例較高；台灣民眾面臨不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參與宗教性的社團的比例相當穩定，可見，民眾參與宗教社團的意涵是需要更進一步討論。台灣的宗教活動大致上是以廟會為核心的宗教參與活動。這些宗教活動往往是社區事物、政治地方派系活動的核心，地方政治首長也擔任廟會中重要職務（蔡常斌 2005）。選舉時，廟會和宗教組織往往是資源動員很重要的管道。傳統鄰里社團靠著地理親近性，參與社團的成本很低，且具有凝聚（bonding）的效果。台灣在解嚴後，社區營造的專業人士，進入社區和傳統地方派系產生權力競逐時，地方派系若和廟會等地方祭祀宗教活動

結盟，這些具有建構地方公民參與和公民性目的的參與者往往是無法和傳統勢力抗衡（吳介民、李丁讚 2005）。Putnam的研究發現美國社團參與的社會資本明顯下降的趨勢是由於鄰里的社團參與下降；但過去二十年，台灣民衆情感性的社團參與沒有顯著的變遷趨勢，也可以說情感性社團反而是台灣過去持續存在穩定不變的民間社會參與力量。本研究的發現，意涵了台灣在短短的民主化發展過程中，過去傳統廟會和地方派系的地方勢力仍然是一個很強大的制度慣性；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偏好參加的工具性社團的力量，沒有增加，反而下降，在邁向以市民社會為主力的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這將是台灣需要面對的一個潛在問題。

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期望能降低地方性較封閉的社團參與，增強高等教育或中產階級者社團參與的角色功能。學者都認為能健全民主政治發展的市民社會，是需要仰賴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社會參與，才能使市民社會更加成熟。台灣過去二十年來雖然高等教育人口急速擴張，但反而在社團參與上出現衰退趨勢，使得有利於民主發展的社團參與的公共性與市民政治反而萎縮。許多個案質化研究也一再指出台灣過去二十年的民主發展，市民社會的公共性不強。台灣民衆參與情感性社團的數目保持穩定的趨勢，情感性社團參與會強化血緣、地緣和宗教的集體情感，是具有較封閉的社會控制連結（bonding）效應，而缺乏多元包容的鬆散結合跨地方性團體的橋樑性（bridging）連結的效應。這樣的社團參與模式不利於多元包容的溝通發展。

最後，本研究在有關於大型調查的社團參與問題設計上，有些建議。大部分的全國性調查有關社團參與的題目，都只有問過去一年或目前是否有參與某些社團。換言之，我們這樣的詢問方式，是可以掌握近期的社團參與的行動。使用內政部的社團成員資料應該是比較不正確

的，因為這些資料，無法測量人頭會員，也無法測出這些會員近來是否有參加社團活動的行動。西方大型調查有關社團參與的問題，都是採用詢問社團類型。有關社團類型的分類要一致，本次研究爲了將八年資料合併，在政治團體和其他團體上作了些微的調整。但期望以後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問卷設計時，在社團參與的問題設計上要考量長期比較的目的而設計。本文在分析民衆社團參與程度是僅使用參與社團數目、參與情感性社團數目和參與工具性社團數目。但Putnam和Skocpol還使用了許多其他參與程度的指標，建議台灣社會變遷調查，未來在社團參與的面向上，能增加參與程度和可以解釋民主參與的政治行動等題目，以便市民參與和民主社會的政治參與的理論驗證得以進行。

作者簡介

熊瑞梅，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過去十年來的主要研究重點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使用大型調查資料，進行有關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研究的相關議題研究；另一個部分是台灣高科技產業勞力市場的制度分析與專利發明人的創新網絡研究。

張峰彬，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興趣是從比較的觀點來研究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方面的議題。除了從事東亞跨國比較的實證研究之外，目前也關注台灣在教育與勞力市場連結方面的議題。

林亞鋒，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主要研究興趣是社會資本與市民參與、社會階層與政治社會學。

參考書目

- 王甫昌，2003，〈社會運動〉。頁421-452，收錄於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出版社。
- 王金壽，2004，〈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縣為例〉。《台灣社會學》7: 177-207。
- 行政院主計處，2003，《社會發展趨勢調查》。台北：行政院主計處出版。
- 朱雲漢，1989，〈寡占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頁139-160，收錄於台灣研究基金會國防研究小組編，《解剖台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朱雲漢，1990，〈中產階級與台灣政治民主化〉。頁233-244，收錄於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出版社。
- 李丁讚，2004，〈導論：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在台灣的發展〉。頁1-62，收錄於李丁讚主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李允傑，1992，《台灣工會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巨流出版社。
- 林亞鋒，2007，《社團參與、政黨鑲嵌與政治行為之變遷——以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為資料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勝偉、顧忠華，2004，〈社會資本理論定位與經驗意義：以戰後台灣社會變遷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37: 113-166。
- 何明修，2000，〈台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黨外、草根

- (1980-1986)》。《台灣社會學》2: 97-162。
- 何明修，2006，《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台北：群學出版社。
- 吳介民，2002，〈解除克勞賽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會學》4: 159-198。
- 吳介民、李丁讚，2005，〈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台灣社會學》9: 119-163。
- 范雲，2003，〈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5: 133-194。
- 徐永明、陳鴻章，2004，〈地方派系與國民黨：衰退還是深化？〉。《台灣社會學》8: 193-228。
- 蔡東杰，2002，《台灣與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較》。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 蔡淑鈴，1990，〈中產階級的分化與認同〉。頁77-96，收錄於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出版社。
- 張茂桂，1990，〈知識份子與社會運動〉。頁189-209，收錄於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出版社。
- 蔡常斌，2005，《寺廟組織與平安燈文化的建構：制度與網絡的機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新煌，1990，〈總論：台灣的中產階級何來何去？〉。頁5-20，收錄於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出版社。
- 蕭新煌、尹寶珊，1998，〈政治轉型與集體認同變化：台灣與香港的比較〉。頁207-255，收錄於劉兆佳、尹寶珊、李明、黃紹倫編，《華人社會的變貌：社會指標的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亞太所。

蕭阿勤，2008，《回歸現實：台灣1970時期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Bear, Douglas, James Curtis and Edward Grabb, 2001, "Has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ctivity Declined? Cross-national Analysis for Fifteen Countries."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8(3): 249-274.

Breiger, R. L., 1974, "The Duality of Persons and Groups." *Social Forces* 53 (2): 181-190.

Cheng, Tun-jen and Stephan Haggard, 1992, "Regime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p. 87-110 in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edited by Tun-jen Cheng and Stephen Haggard. Boulder: Lynne Rienner.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95-120.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vis, James A., 2004, "Did Growing up in the 1960s Leaves a Permanent Mark 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vidences from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8(2): 161-183.

Diamond, Larry,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rickson, B. H., 2004, "The Distribution of Gendered Social Capital in Canada." Pp. 27-50 in *Creation and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 A New Research Program*, edited by H. Flap and B. Völk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eld, Scott, 1982, "Social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Similarity among Associ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797-801.

Fung, Archon, 2003,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ories, Hopes, and Real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515-539.

Gesthuizen, Maurice, tom van der Meer and Peer Scheepers, 2008, "Education and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Do Educational Effects Differ due to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5): 617-632.

Gilley, Bruce, 2008, "Taiwan'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Model for China?" Pp. 215-242 in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edited by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Glanville, Jennifer L., 2004,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Why Organizational Location and Type are Important?" *Sociological Forum* 19(3): 465-491.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Hyman, Herbert and Charles R. Wright, 1971, "Trend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of American Adults: Replication Based on Secondary Analysis of National Sample Surve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191-206.

Inglehart, Ronald,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lmijn, Mathijs and Henk Flap, 2001, "Assortitative Meeting and Mating: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Settings for Partner Choices.”
Social Forces 79: 1289-1312.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Civic Engagement, or Tru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Hong Kong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sed version), September 25, 2000, Hong Kong.

Mannheim, Karl, 1952[1927],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Pp. 276-320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aul Kecskemet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Marsden, Peter V., 1990, “Network Diversity, Substructur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ntact.” Pp. 397-410 in *Structures of Power and Constraint: Papers in Honor of Peter Blau*,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Marshall W. Meyer and W. Richard Sco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son, William M. and Stephen E. Feinberg, 1985, *Cohort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Beyond the Identification Problem*.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McPherson, M., L. Smith-Lovin and James M. Cook, 2001, “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1): 415.

Madsen, Richard, 2008, “Relig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Pp. 79-94 in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edited by Bruce Gilley and Larry Diamond.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Paxton, Pamela, 1999,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 88-127.
- Popielarz, Pamela A. and J. Miller McPherson, 1995, “On the Edge or in Between: Niche Position, Niche Overlap, and the Duration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698-720.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65-78.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audenbush, Stephen W. and Anthony S. Bryk, 2002,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ose, Arnold M., 1954, *Theory and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Rotolo, T., 1999, “Trend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8: 199-212.
- Ryder, Norman B., 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843-61.
- Skocpol, Theda, 2003, *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Tocqueville, A. de, 1961,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 Völker, Beate, Henk Flap and Gerald Mollenhorst, 2009, "Changing Places: The Influence of Meeting Places on Recruiting Friends." Pp. 28-48 in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on Markets,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edited by Ray-May Hsung, Nan Lin, and Ronald L. Breiger. New York: Routledge Publisher.
- Yang, Yang and Kenneth C. Land, 2006, "A Mixed Models Approach to the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Data on Trends in Verbal Test Score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6: 75-97.
- Yang, Yang and Kenneth C. Land, 2008,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Fixed or Random Effect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36(3): 297-326.